

转型的阵痛：

张宝明 著

ZHUANXING DE ZHENTONG ERSHI SHIJI ZHONGGUO WENXUE SIXIANG YU WENHUA QIMENG LUNHENG

20 世纪中国文学思想与文化启蒙论衡

 学林出版社



ZHUANXING DE ZHENTONG
ERSHI SHIJI ZHONGGUO WENXUE SIXIANG
YU WENHUA QIMENG LUNHENG

转型的阵痛：

20世纪中国文学思想与文化启蒙论衡

上架建议：文学评论

ISBN 978-7-80730-480-7



9 787807 304807

定价：23.00元

易文网：www.ewen.cc

转型的阵痛：

张宝明 著

ZHUANXING DE ZHENTONG ERSHI SHIJI ZHONGGUO WENXUE SIXIANG YU WENHUA QIMENG LUNHENG

20世纪中国文学思想与文化启蒙论衡

 学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转型的阵痛:20世纪中国文学思想与文化启蒙论衡/
张金明著. —上海:学林出版社,2007.12
ISBN 978-7-80730-480-7

I. 转... II. 张... III. 现代文学—文学评论—中国
IV. I2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92116 号

**转型的阵痛:20世纪中国文学
思想与文化启蒙论衡**



作 者——张宝明
责任编辑——薛 仁
封面设计——周剑峰

出 版——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学林出版社(上海钦州南路81号3楼)
电话:64515005 传真:64515005
发 行——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学林图书发行部(钦州南路81号1楼)
电话:64515012 传真:64844088
印 刷——江苏启东人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889×1194 1/32
印 张——11.375
字 数——24万
版 次——2007年12月第1版
2007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 数——3000册
书 号——ISBN 978-7-80730-480-7/I·92
定 价——23.00元

(如发生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作者介绍

张宝明 男,1963年8月生于安徽蒙城。1985年毕业于安徽师范大学中文系,获学士学位;1988年毕业于河南大学中文系,获中国现代文学硕士学位;1995年7月,南京大学获博士学位,武汉大学出站博士后。现任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诗学研究中心研究员、硕士生导师。从事20世纪中国文学思潮、文化思想史研究。曾在《文学评论》、《南京大学学报》、《学术界》、《福建论坛》、《天津社会科学》、《文史哲》、《文艺报》、《光明日报》、《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等报刊发表、转载论文50余篇,出版学术专著《启蒙与革命——五四“激进派”的两难》、《自由神话的终结——20世纪启蒙阙失探解》、《忧患与风流——世纪先驱的百年心路》、《20世纪:人文思想的全盘反思》、《多维视野下的〈新青年〉研究》等多部,共计100余万字;主编《回眸〈新青年〉》(语言文学卷、哲学思潮卷、社会思想卷)。获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三等奖各2项。2001年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2006年获“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入选称号。

目 录

第一编 文学史与思想史的互动/1

第一章 原“人”：五四文学观念的世纪末回眸/1

1. “个人本位”：文学启蒙共执的思想平台/1
2. “人的文学”：脱胎于指归不同的文学观念/3
3. “人的发现”：观念的差异是最大的差异/11
4. 后五四时代：文学症候与历史反思/16

第二章 《新青年》与中国现代文学谱系的生成/20

1. 未雨绸缪：新文学的酝酿/21
2. 山雨欲来：新文学的怀胎/24
3. 新文学的两难(上)：在“言之有物”与“写实主义”之间/27
4. 新文学的两难(下)：文学之“物”与科学之“物”之间/32

第三章 问题意识：在思想史与文学史的交叉点上/37

1. 心声：“一则亦喜，一则亦忧”/37
2. 换位：“文史不分家”与“文史亦分家”/39
3. 问题：让学术成为学术的理由/41

第四章 《20世纪中国文学通史》的意义及其局限性/45

1. “长时段”：文学与思想史/46
2. “博物馆”：文本与文学史/50
3. 主体性：本体与个性化/54

第五章 文学、道德与知识分子的良知及使命/58

1. 道德的时代性：成熟的道德观念应该有准确的定位/58
2. 道德的相对性：无论如何都将不是我们的首选/63
3. 道德、理性与良知：公共知识分子的责任/69

第二编 “问题”与“主义”的言说/74

第六章 “问题”与“主义”：两种思想谱系的历史演绎/74

1. 研究之研究：“问题与主义”的学术之争/76
2. “问题与主义”：思想文本的隐形格局/78
3. “导师”与“学生”：两种知识体系的相对凸起/84

第七章 从学理型政治到政治型学理：“问题与主义”两种思想路径的后续言说/94

1. 实证之一：“宣言”的底牌/94
2. 实证之二：“实验”的底气/96
3. 实证之三：“歧路”的底色/100

第八章 “中国之前途：德国乎？俄国乎？”/105

——“问题与主义”之后的“主义与主义”之争

1. 罗素：中国学界的又一深情期待/107
2. “浑朴”：知识界的共同思想面相/109
3. “主义与努力”：交相为用的思路格局/116
4. 改良与革命：现代性内部的张力/122

第九章 “改良”与“革命”：20世纪中国启蒙逻辑的再诠释/124

1. 启蒙与革命：两次逻辑命题的历史描述/124
2. “弱势”与“强势”：激进与保守的失衡/126
3. 改良与革命：启蒙引导的两种现代路径/136

第十章 《新青年》与中国现代性的转向/139

1. 《新青年》初期陈独秀的国家与个人观/139
2. 个人与社会关系的哲学透视/144
3. 个人与国家关系思想的集束与辐射/147
4. 个人与社会关系在思想史上的闪断与整合/151

第三编 启蒙与革命之两难/160

第十一章 启蒙的悖论(1911—1921): 20 世纪思想史上的困惑/160

1. “国民”与“民国”: 启蒙招致的两难/160
2. “共和”与“共斗”: 悖论的必然生成/169

第十二章 越位的人道主义: “五四”启蒙残缺性的再反思/174

1. “仁”: 在士与知识分子之间/175
2. “博爱”、“平等”、“自由”的先鋒/179
3. Humanism 的中西差异/182
4. 人道主义的倾斜/184
5. 走向民粹主义/189

第十三章 解构与突围: 启蒙的历史与历史的启蒙/193

1. 启蒙的历史: 20 世纪前 20 年启蒙回眸与再现/195
2. 历史的启蒙: 20 世纪后 20 年的启蒙比照与反思/200

第十四章 “新启蒙”与“后启蒙”: 两种启蒙话语系统对话的可能/210

1. “新启蒙”和“后启蒙”: 本是同根生/211
2. “新启蒙”与“后启蒙”: 相煎何太急/218

第十五章 从启蒙到革命: 来自道德理想的引渡/226

4 转型的阵痛：20 世纪中国文学思想与文化启蒙论衡

1. 绪论：道德命题在革命中的位置/226
2. “革命”：来自道德理想“彼岸”的致命诱惑(上)/227
3. “道德”：“此岸”与“彼岸”的逻辑贯通(中)/231
4. “自由”：在此岸道德泛化中无地彷徨(下)/235
5. 结语：道德理想主义的再造/239

第四编 激进与保守论衡/242

第十六章 “想象的理性”：论辜鸿铭在 20 世纪思想史上的意义/242

1. “本是同根生”：作为五四人物的“倭杰”/242
2. “想象的理性”：文化守成的逻辑依据/244
3. 特立独行：“守”出真性情/250

第十七章 从高调到低调：陈独秀前后民主观的再审视/254

1. 高调与低调：对两种不同民主路径的理解/254
2. 高调民主：“五四”时段的主旋律/257
3. 低调的民主：后期思想见解的升华/251

第十八章 “调和”与“独行”：李大钊从保守到激进的逻辑依据(1914—1921)/265

1. “调和”：“共和”理想下的思想生成/266
2. “一力之独行”：新理想的诱惑/272
3. 创旋性转化：过渡的逻辑依据/275
4. “物心两面的改造”：世纪之交的历史评说/280

第十九章 国民性：沉郁的世纪关怀/282

1. 着眼点：同立于思想牵轮的圆心/282
2. 兴奋点：“同唱一首歌”/286
3. 归宿点：来自不同终端的关怀/289

第二十章 超越与回归：近代文化启蒙与中国古典传统/297

1. “国粹”情结：以“心”入世的道德理想/298
2. “力不从心”：“心力”超拔的道德阐释/303
3. 古典人文性情：“自我”膨胀的“精神胜利法”/307

第五编 现代性空间的开拓/314

第二十一章 文化与政治的歧路：重议“五四”文化阵营的思想格局/314

1. “不谈政治”的悖论/314
2. 文学的“改良”与“革命”/318
3. “人”之两种导向/322

第二十二章 从“导师”与“学生”的关系看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谱系/328

1. 共识：朦胧启蒙理念下的“人”意/328
2. 歧义：启蒙导师的“意念之差”/331
3. 走向：“十字路口”的历史选择/333

第二十三章 现代性空间的开拓：“新青年派”知识群体走向社会主义的心路历程/338

1. “巴黎和会”：在“公理”与“强权”之间/339
2. “劳工神圣”：在“体力”与“脑力”之间/342
3. 人道主义：在“竞争”与“互助”之间/344
4. 马克思主义：在“竞争”与“互助”之间/348

跋 走向人文学之路/350

第一编

文学史与思想史的互动

第一章 原“人”：五四文学观念的世纪末回眸

论及 20 世纪新文学的孕育、脱胎、成长,我们不能不从五四讲起,而讲这个文学论题,我个人首先想到了三个倡导文学观念最力的精英:陈独秀、胡适、周作人。当然,在行文中我们为了进一步证实本文的论题,诸如鲁迅、李大钊这样的当事者也是不能缺席的。这里,笔者重在说明:五四文学观念发生前的胎动期至少有三重精神气质。这就是执意功利化、适意功利化和一意个性化的基本路径。追溯并爬梳五四文学的思想渊源,对今天跨入新世纪的作家来说,无疑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1. “个人本位”:文学启蒙共执的思想平台

一个时代文学观念的形成与该时代思想文化界的情形息息相关。五四这个特定的时代也不例外。

1915 年 9 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很快,这棵散发着深厚思想文化气息的梧桐就引来了“凤凰”,胡适就是其中的一员。尽管他们合作之初在“谈政治”与“不谈政治”的问题上有着根本的逆差,但本着求同存异的开放心态,还是

在那高低起伏的音符中唱出了不和谐的谐音。^① 后来李大钊、鲁迅、周作人等的参与更是精彩纷呈，一改中国思想文化界的万马齐喑、阴云密布的气象。值得注意的是，一批靠《新青年》起家的思想、文化、文学精英都在同一片蓝天下唱出了同一首歌：个人本位。

这是对传统的一次富有魄力的挑战。孔子的“仁”看起来是对人的关爱，但在终极意义上他老夫子说的不外怎样抑制私欲、克己复礼与如何修身齐家、一味奉公。为了社会的稳定，自我就是一截可有可无的盲肠。人的个性、独立性都被个体之外的“圣道”消解得一千二净。时临五四，陈独秀早在《青年》的创刊号上就声嘶力竭地吆喝起“脱离夫奴隶之羁绊，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之谓”的买卖：“我有手足，自谋温饱；我有口舌，自陈好恶；我有心思，自崇所信。绝不认他人之越俎，亦不应主我而奴他人。”^② 这即是“个人本位”的雏形。时至同卷 4 号，主编更是将卖点热化：“思想言论之自由，谋个性之发展也。……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名与个人主义相冲突，实以巩固个人利益为本因也。”进而，他公然将拍卖的槌声落定：“以个人本位主义，易家族本位主义。”^③ 与陈独秀的义勇之气形成对比的是胡适的绅士“风情”。胡适的表白自然没有陈独秀直率、大胆、鲜明。他不是在有为之的论文里单刀直入，而是以一种优雅、温婉的方式于一篇谈“易卜生主义”的文学导论中抛出：“社会最爱专制，往往用强力摧折个人的个性(individuality)，压制个人自由独立的精神。等

① 张宝明：《启蒙与革命——五四激进派的两难》，学林出版社，1998。

② 陈独秀：《敬告青年》，《新青年》1 卷 1 号，1915 年 9 月 15 日。

③ 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新青年》1 卷 4 号，1915 年 12 月 15 日。

到个人的个性都消灭了,等到自由独立的精神都完了,社会自身也就没有生气,也不会进步了。”与同仁陈独秀的“谋个性之发展”并行不悖,针对“社会最大的罪恶莫过于摧折个人的个性,不使他自由发展”的状况,使同样“主张个人须要充分发达自己的才性,须要充分发展自己的个性。”^①胡适的“易卜生主义”尽管低调,但仍是以人为本位的个人主义思想。周作人对新文学的摧法一度不以为然,所以他采用“一竿子打到底”的办法提出:“人的文学”。审视几千年来人的资格的缺席,使说要去“辟人荒”。他为自己倡导的“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开出了这样的理由:“第一,人在人类中,正如森林中的一株树本。森林盛了,各树也都茂盛。但要森林茂,却仍非靠各树各自茂盛不可。第二,个人爱人类,就只为人类中有了我、与我相关的缘故。”因此他继续引申说,爱别人必须“先知自爱”,大有“自私自利”的味道。^②在这一点上,它与胡适在《易卜生主义》所讲的道理可谓“大同”。

五四精英们就是在这一思想逻辑上共同酝酿、指导并身体力行着现代文学创作的。

2. “人的文学”: 脱胎于指归不同的文学观念

我们看到,好像是历史的有意安排,陈独秀高调、胡适低调,接摧而来的周作人甚至有些消极。这如同“新”与“旧”的对比不能一摧而论一样,其实高调与低调的处理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质而言之,同是“以人为本”的个人本位主义论者未必摧在一个锅里吃到底。这里,我们不妨就他们三位文学观念中“人本”的指归审视一下各自的人物原型之“来龙”。

① 胡适:《易卜生主义》,《新青年》4卷6号,1918年6月15日。

② 周作人:《人的文学》,《新青年》5卷6号,1918年12月15日。

就个人本位主义的说法，我们这里不妨再给个“分析”的说法。这个从具有分析思维传统的西方舶来的概念这次却笼统得让精英们有了“自由”发挥的机会。Humanism，在中国直到目前至少有三种与本论相关的翻译：人道主义、人文主义、人本主义。也许，这也是个人理解 Humanism 的权利。

我们还是先从《新青年》的庄家陈独秀讲起。毋庸讳言，陈独秀心中一直呼唤的是“新青年”的形象。为此，他千呼万唤，奔走呐喊，一副热火朝天的样子。在时人心目中，他俨然就是一位手执如椽大笔、风风火火闯九州的热血汉子。对这样一位从辛亥革命丛林走来，而万变不离其“政”的精英来说，要他充当一回文艺女神缪斯，真可以说是难煞他喽！所以，陈独秀一在文学理论上亮相就有点“马失前蹄”的征兆。不客气地说，甚至有点“冒傻气”的味道。更何况他那点点滴滴的文学理论细胞，都是靠他的老乡胡适之“里星之火”点燃的呢！主编在首卷上就曾以高瞻远瞩的目光和口气拿《现代欧洲文艺史》当作了文艺女神的令箭，蹄如什么自然主义、理想主义等数不尽的新名词、列不尽的洋作来——查摆开来，但对文学的何去何从却让人如“丈二和尚”。在发表了谢无量的旧体诗后，他也会满怀信心地评点说“文学者，国民最高精神之表现也”，并将谢无量的诗说成是“天下文章”。^① 可当胡适寄来批评文字后，便没了主张：“一经足下指斥，曷胜惭感”，于是还诚惶诚恐地他讨着：“若来书所谓加以论断，以仆不学无文，何敢何敢！”^②带着这样的精神气质

① 陈独秀：《谢无量诗附识》，《新青年》1 卷 3 号，1915 年 11 月 15 日。

② 陈独秀：《关于文学革命的通信》，《新青年》2 卷 2 号，1916 年 10 月 1 日。

去论文学,自然是将外国当代作家笼而统之地一锅煮了。接下来的“爱我所爱”自然就让人无所适从:“予爱卢梭、巴士特之法兰西,予尤爱虞哥、左喇之法兰西;予爱康德、赫克尔之德意志,予尤爱梭特、郝卜特曼之德意志;予爱倍梭、达尔文之英吉利,予尤爱狄德士、王尔德之英吉利。吾国文学界豪杰之士,有自负为中国虞哥、左喇、桂特、郝卜特爱、狄梭士、王尔德者乎?有不顾迂儒之毁誉,明目张胆以与十八妖康宣战者乎?予愿拖十二生的大炮,为之前驱。”^①不论是哲学家、思想家还是文学家,不论是古代的、近代的还是现代的,也不论适合不适合中国当前文学界,一股脑儿地标榜起来,多少有些乱点文艺谱的味道。不过值得一提的是,陈独秀甘愿在文学更新上做先锋,为新文学的创作杀出一条血路,还是振聋发聩、气度非凡。那“愿梭十二生大炮为之前驱”的铿锵有力之声将永远回荡在中国新文学史的上空。他所主持的《新青年》为中国新文学的作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理论、创作平台。应该看到,如果没有他的蛮干,也就没有这样崭新文学时代的到来。问题的关键也在这里,陈独秀既没有创作欲望,也没有实践这个观念,为何又要这样蛮干呢?

早在《新青年》创刊之前,陈独秀曾经是中国小有名气的最早创办白话拖的人物之一。1903年在上海入主《国民日报》时就在深厚的政治情结下梭上了文学创作的“虎皮”。他与苏曼殊翻译的《惨世界》哪里是在翻译,简直就是借雨果的“悲惨世界”述说中国国倍。那法兰西的“尚海”就是上海,那狰狞的“满周苟”无疑是清朝“满洲狗”。这时的他们哪里还

① 陈独秀:《文学革命论》,《新青年》2卷6号,1917年2月1日。

顾及什么艺术性，简直就是拿文学当作发泄私愤的工具、社会改良的手段。《安徽俗话报》也许对学术界的同仁并不陌生，但陈独秀在上面发表他的第一篇小说的史料不是每个人能耳熟能详的。《黑天国》的确是主编为了吸引读者来个“噱头”，可就是在这个噱头的蛛丝马迹中我们却能发现与后期思想密切相关的微言大义。具有章回体形式的小说《黑天国》直接用主人公荣豪（既光荣又自豪）的语言抒发“索爱自由主义”、“惟自由万岁”的政治思想，通篇的寓意都是图解政治情怀的文字。

极度的功利化自然使他的文学观念也夹杂着政治那条甩不掉的尾巴。陈独秀惟一的一篇专论文学更新的文章中将“革新文学、革新政治”相提并论，并一改他当年向胡适“购稿”时的虚心，即使是凭借胡适文学思想的燎原，他也不领情似的指点江山起来：“政治界虽经三次革命，而黑暗未尝稍减。其原因之小部分，则为三次革命皆虎头蛇尾，未能充分以鲜血洗净旧污；其大部分，则为盘踞吾人精神界根深蒂固之伦理道德、文学、艺术诸端，莫不黑幕层张，污垢深积，并此虎头蛇尾之革命而未有焉。此单独政治革命不生若何变化，不收若何效果也。”^①原来，那一部分人惨无人道、“黑幕层张”，而我们这一部分人就要起而抗争、“洗净旧污”，即使流血也在所不惜。个人本位主义画地为牢，“新青年”也要带着镣铐跳舞。谁让你是新青年呢？是新青年就要有远大的理想、高深的主义，以及先解放他人、再解放自己的大事业情怀。按照这个逻辑，个人本位主义就是人本主义，人本就是

^① 陈独秀：《文学革命论》，《新青年》2卷6号，1917年2月1日。

以人为本,而现实中的每个人都是个人,以人为本就要将每个人当人看。这样,个人本位就很轻松地滑落到了“人人”的地牢里。而且“人人”很快就是他人的名词,“他人”又很快演绎为唯名论意义上的抽象的“人民”、“群众”、“大多数”、“社会”等空洞概念。于是“自我”失落,个性消泯,思想阉割。这,固然是陈独秀在起初没有想到的,但实践就这么残酷地证明了这个事实与逻辑。

不言而喻,陈独秀在 Humanism 一词三维意蕴里,独独偏向向了人道主义一隅。俨然是一个同情弱者、主持正义、讲求公平、打富济贫的救世菩萨。一面是可怜人间苦难的菩萨心肠,一边是冷酷相向的血腥气息,这与中国传统的以民为本、兼爱、博爱思想不谋而合。不难发现,怨恨的主题在 20 世纪文学中频繁出现,不能不说与这种血腥的温柔和温柔的血腥息息相关。当功利化的人道主义文学观念一步一步走向“可怜平民的哭声”的时候,陈独秀开始关心多数,而对“军国主义和金力主义”大加斥喝,并希望世界上充满“友爱互助情谊”,追求“美的、善的、和平的、相爱互助的、劳动愉快的、全社会幸福的”生活。^① 为了迎合主编之意,李大钊、周建人、高铭石等一批作者也都从人道主义的角度在《新青年》上大谈特谈“生存竞争与互助”问题。李大钊就曾要求把“协和、友谊、互助、博爱的精神”“推及于四海,推及于人类全体的生活的精神”。^② 这完众是伦理、道德之人道主义的克隆者。深究该提法的原动力,不外乎对人(更准确的说是人类)的关爱。

① 陈独秀：《本志宣言》，《新青年》7 卷 1 号，1919 年 12 月 1 日。

② 李大钊：《阶级竞争与互助》，《每周评论》第 29 号，1919 年 7 月 6 日。